

斯·茨威格著 姜瑞璋 廖綵胜译

一个古老的梦

伊拉斯谟传

辽宁教育出版社



序

一个古老的梦

伊文斯著
李金海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个古老的梦

——伊拉斯谟传

斯·茨威格 著 姜瑞璋 廖綵胜 译 许崇信 校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奥)斯·茨威格著;姜瑞璋,廖
綵胜译;许崇信校.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67-0

I. —… II. ①斯…②姜…③廖…④许… III. 伊拉斯谟, E.
(1466~1536)-传记 N. B503.9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896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赵中男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王 玲
出 版 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 数	110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5.70 元



伊拉斯谟像
1520年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作
(罗浮宫藏)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道。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弃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茨威格和伊拉斯谟

陈乐民

我第一次听说十五六世纪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这个名字是在四十多年前的维也纳；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十年了。然而硝烟似乎还没有完全散尽，人们又在谈论另一次大战的可能性了。于是，出现了各种流派的保卫和平、防止战争的运动，警觉着死火复燃。其中有些和平主义运动和教会（如公谊教会等）倡导的和平运动，都纷纷把伊拉斯谟当作他们的先驱。那时的维也纳，尤其是斯堪地那维亚国家，都是和平运动比较活跃的地方，所以这个名字经常不绝于耳，成为反对暴力、爱好人类和平、人民友爱亲睦的象征。再过若干年月，知识渐长，在一本什么书里发现伊拉斯谟不仅是为人平和、宽厚而圣洁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位为欧洲近世文明开路的哲学家。那本书上说，伊拉斯谟是位告别中世纪的先知先觉，为了清洗中世纪给社会涂上的污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之一是编了一本教导世人什么叫做文明社会的书，里面关于在什么场合应当怎样举止，等等，很有些像我们今天的“几要几不要”之类。我越来越觉得这位前哲很有意思，他仿佛在黑暗笼罩的时代里让一丝清新的色调流动了出来。及至读了《愚人颂》的片断，伊拉斯谟作为迎接新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就明确起来、完整起来了。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得知这本《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①

^① 本书原名《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现在的书名为中译本编者所拟。——《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者

刚刚被译成中文时，便主动要求先睹为快。拿到译稿校样，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它。当然作者茨威格也同样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个古老的梦里，我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自然是伊拉斯谟本人，另一个便是这本书的作者、鼎鼎大名的斯蒂凡·茨威格。他们两个人相差四个世纪，却好像呼吸着同一时代的空气，以至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常叠现出茨威格的身影。

我想，要从这本书里咀嚼出味道来，了解茨威格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必要的。这本书完成于1934年，希特勒已经上台了。这对于茨威格意味着多重的精神打击和折磨。犹太人的命运和处境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第一次欧战余悸未消，茨威格又敏锐地嗅到了火药味；世界可能再次被推到战争火坑的边缘，人类的精神财富可能重新遭受破坏；他预感到，人的尊严、自由、文化将再度进入炼狱。此时，茨威格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刚刚完成，突然，一道命令，在德国舞台上严禁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的立像被拆除了……宁静文雅的山城萨尔茨堡上空也蒙上了狰狞的黑云，禁令迭出，再也容不下一个茨威格了。

《伊拉斯谟传》正是在这种气氛里诞生的，茨威格在他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追述道：“我在那本书中试图给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画像，那位人道主义者虽然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反动，可悲的却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种反动。”

茨威格是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伊拉斯谟也是一个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伊拉斯谟那样厌恶愚昧和非理性，那样热爱真理与知识，他认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顺理成章，因此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为什么一定要怒目相视，为什么新世纪只能在狂热的裂变中诞生而不能平静地到来，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在马丁·路德和教皇之间作出选择，为什么不能用理智代替偏执、用中庸代替极端……伊拉斯谟弄不明白的问题，到茨威格同样惑然不解，他们都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终生的精神负担。

伊拉斯谟是个人文主义者，他的人生目的是回归真理的源泉，在他那个时代这首先就是要把几个世纪曲解了的《圣经》复其原貌，还其本意，并以他对真理探索的精神把智慧之光传给世人。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准备土壤的；然而事情常常不是按常情常理发展的；当新事物在大喊大叫以排山倒海之势而至的时候，那些细水长流的、时而是默默的、然而是不舍地具有开拓前景之功的工作，往往是人们不容易看到的。

伊拉斯谟追求的最终目的与马丁·路德本不该相互冲突，都是要救治教会的弊病。但是所取方法的不同终于使他们如冰炭之不能相容。马丁·路德是现实主义的革命家，他的背后是农民，是德意志民族，他掀起的是风暴。茨威格笔下的伊拉斯谟是理想主义的哲学家，相信单凭理性的力量就能战胜愚昧和谬误，他眼下是正在分裂的欧洲、心里却装着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们两个人，一个主张从教会外部彻底改造它，一个则宁愿在教会内部去革除弊端。伊拉斯谟的悲哀恰恰在于，由于本能地恪守人格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无疑是可贵的），因而在关键时刻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出面为马丁·路德辩护，结果就被放在了宗教改革的对立面。清高自持的操守，致使伊拉斯谟的行为悖离了信念，这对于他说来确实是一种有苦难言的结局。茨威格对伊拉斯谟尽管满怀崇敬和深情，但是也仍只能承认：“人文主义者根本性的错误，在于他们想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教训人民，而不是深入群众，千方百计去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

伊拉斯谟的晚年是孤寂和凄凉的，他惟一的慰藉是在宁静的书斋里去宁静地写他的书——如蚕吐丝般传播真理和知识的书。一个把文化当作生命的人，在精神上是富有的，虽然他生活得平淡而又平淡。

这本书问世的第八个年头（1942年），茨威格不堪忍受时代的乖戾、暴虐、诡谲和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和他的夫人在蛰居的巴西双双自戕。茨威格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怎样毁灭人的生命和精神财富，为此，他曾为和平而奔走，为欧洲统一的理想而呐喊，为拯救人类文明而

向人的良知呼吁，他用整个生命写啊写……然而现在这场火来得更加猛烈和无情，茨威格完全绝望，精神彻底崩溃了，最后只能选择用死来抗争的道路，连伊拉斯谟那样凄苦却安谧的晚年也没能享受到。

那么，茨威格写这本《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究竟打算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呢？恕我偷懒，且让我抄下卷尾的这几句话来表述吧。

“……人文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眼光广阔、头脑清晰的基础上的理想。它注定永远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再代代传下去。未来全人类将和睦相处，协调一致地为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从未被忘却。”

“……因此，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中包含了一种承诺，这承诺充满着为了未来而奋斗的创造力。”

伊拉斯谟和茨威格都有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内在矛盾，然而他们为人类所预约的期望却是长久不衰的。

最后，这本书之所以引人入胜，还有译者姜瑞璋、廖綵胜和校者许崇信的功劳，他们的译笔相当传神：茨威格的笔尖总是滴着感情的，这本书的译笔也同样滴着感情。

1997年8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目 录

茨威格和伊拉斯谟

陈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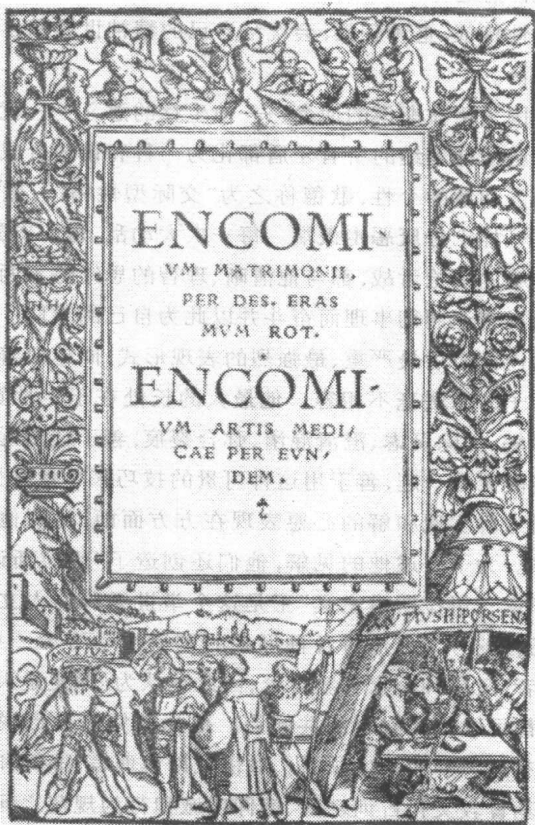
目标与意义	1
时代一瞥	13
模糊不清的青年时代	18
肖像	33
工艺大师	42
伟大与局限	56
强大的对手	74
为独立而挣扎	97
较量	111
结局	125
伊拉斯谟留下的遗产	138

目标与意义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那个时代最伟大、辉煌的星斗，如今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那浩瀚丰硕的论著——全用一种已经废弃的、超民族的语言（人文主义者所用的拉丁语）写成，如今都静悄悄地栖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无人问津。这一批当时曾经饮誉世界文坛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什么启示。他的个性在那些气势非凡、更为伟大的改革者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伊拉斯谟的性格令人费解，总是充满矛盾、难于捉摸。在他的私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妙趣横生、可为人津津乐道的轶事：一个已经退休却仍然从事十分繁忙的智力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什么适合于描绘之处，因而在传记作者眼里，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工作对象。就是他已取得的实际成就，也往往被埋没，使我们这一代人无从鉴赏，犹如一块基石埋藏在建成的大厦底下。为了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位被遗忘的伟大人物有一个清晰的全貌，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在所有西方作家和创作者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第一个自觉的欧洲人，第一个为和平而战的斗士，在人文学科的研究和精神目标的追求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的人生悲剧在于：他为了人类能形成更加合理、更为和谐的精神世界而进行斗争，却遭到了失败。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悲剧，使他和我们情如手足，亲密相连。

伊拉斯谟喜爱许多我们也喜欢的东西：他爱诗歌和哲学，爱

书籍和艺术，爱语言和人民；他爱全人类——不论种族与肤色，只为更高层次的文明。狂热是唯一使他感到深恶痛绝的东西，他认为这与理性背道而驰。他可说是凡人中最没有狂热性的人；他是否具有头等的才智或许还有疑问，但他学识渊博则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仁慈和蔼可能并不感人至深，但他具有与人为善的诚意则是毋庸置疑的；他所兼备的这些品德使他对知识界任何形式的偏执都感到厌烦，认为这是增加世界重负的极大罪过。他确信只要双方略作让步，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几乎都可以得到皆大欢喜的调解，因为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人类中间，而任何意见分歧，只要争执范围不肆意扩大，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对于任何形式的狂热——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还是哲学的，伊拉斯谟都认为是妨碍于相互了解的头号大敌，坚决加以抵制。他厌恶任何表现形式的盲从；他憎恶固执、有偏见的人，不管他们是披着教士的法衣还是教授的礼服；他憎恨那些不能理解的人，痛恨任何阶级和种族的狂热分子——这些人要求别人对他们的主张点头称是，对不合自己心意的看法则视为异端邪说。伊拉斯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愿让一些陌生的、无法接受的宗教或政治理论困扰自己。他认为人有权坚持自己观点是理所当然；精神上的完全独立至关重要。他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人；他认为，从教堂的布道坛或大学的讲坛上宣布自己的见解是唯一的真理，是上帝在自己的耳边悄悄地传递给自己——只传递给自己一人的特殊信息，这是对宇宙间存在的十分可喜的多样性加以禁锢。他以自己敏锐、卓越的才智，毕生同狂热分子荒唐的教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对对手异想天开的行径，几乎从不报以宽容的微笑。间或有幸出现这种宽容的时刻，狭隘的狂热主义只不过是智力局限性的一种可悲的标志，是他在《愚人颂》中列举的形形色色的“愚蠢”中的一种；他在该书中对这些品种繁多的“愚蠢”



汉斯·霍尔拜因为《婚礼颂》设计的封面
(见弗罗本版《伊拉斯谟》，巴塞尔，1516年)

作了引人发噱的分门别类,进行了有趣的嘲弄。伊拉斯谟自己则完全是公允不偏,因而即便是势不两立的敌手,他对其瑕疵也会真心地深感遗憾。然而,在心底里,伊拉斯谟无时不感到这种不祥的人性特征,这种狂热,会扰乱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自己和风细雨的生活。

这是因为伊拉斯谟的使命——他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将人类的大脑所能容纳的所有矛盾都化为一种和谐的合成物。他具有愿与人和解的个性,歌德称之为“交际型性格”。歌德也和伊拉斯谟一样十分厌恶走极端。每一次大动乱、每一次骚动、形形色色喧嚷的唇枪舌战,都与他清晰、理智的思维势不两立。他为谋求人类普遍洞彻事理而奋斗并以此为自己的天职。他尤其视战争为内部矛盾最严重、最强烈的表现形式,同他对善于思索的正人君子的想法毫不相容。他最大的长处在于生性宽容,善于容忍谅解、消除疑虑、澄清混淆、弥合裂痕,善于让疏远分离的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善于用这种可贵的技巧来尽量减少冲突。伊拉斯谟这种实现和解的心愿表现在方方面面,得到他同时代人的赞许。为了表述他的见解,他们还创造了“伊拉斯谟主义”这个新词语;“伊拉斯谟主义”正是这个举世无双的人立意要指引人类通往的方向。他将各种形式的创造活动溶于一身,既是诗人、学者,又是神学家和教育家;因此他认为,即便是天差地别的实体,都可以找到融合的共同点。他深信凭借自己说服人的本领,没有达不到的陌生领域。对伊拉斯谟而言,耶稣和苏格拉底之间、基督教义和古训之间、信仰虔诚和行为规范之间都不存在道德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他是一名受任牧师,但他的知识殿堂并不排斥异教徒;同样本着宽容的精神,他将自己摆在与早期基督教著作家同样的地位。对他来说,哲学和神学一样,不过是寻觅神的方法。他对基督教天堂的仰慕并不比对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天国更为虔诚。他也不象卡尔文等一类狂热分子那

样，将生气勃勃、感情洋溢的文艺复兴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大敌，而看成是后者解放了的姊妹。伊拉斯谟四海为家，并不定居在某一国度。这位自觉的欧洲人和世界主义者不承认一国比他国优越。他训练有素的头脑总以一个民族的精英、一个民族中最卓越和最有教养的分子作为衡量这个民族的尺码，因此在他看来，每一个民族都同样值得热爱。联合各个地域、各个种族、各个阶层善良友好的人们，维系于一个开明的大团体之内——这一崇高事业就是他的人生目标。他将当时超越民族的拉丁语变为更为正式、更加灵活的工具，用以传播思想、促进理解，从而为欧洲各民族创造了一种表达手段，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得以超越彼此的边界，紧密地联系在一种和谐的学术氛围之中。这的确是令人难于忘怀的成就。他视野开阔，因而回顾过去时满心欣慰；他生性乐观，因而展望未来时信心百倍。但对世上的野蛮行为——粗暴地搅乱上帝部署、不断破坏天意安排的野蛮行为——他则决然不屑一顾。他将目光投向更高的层面，投向能赋予形式和传播创造性活动的领域；他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拓宽这一领域，使天国的光辉最终得以普照全球。早期人文主义者有一个根本信念，即凡人可以通过启迪而达到完善；这一信念虽然美好，但却正好是他们悲剧性错误之所在。伊拉斯谟和与他有同样的思维方式的人们真心实意地认为：通过普及教育，个人和社会都可以提高文化素养，其中写作、学习和书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早期的理想主义者抱有一种十分感人的真诚信念，认为用学习和阅读的方法坚持不懈地进行教化，人性是可以变得更为高尚的。伊拉斯谟相信书本知识极为重要，因而认为品行端正纯粹是教导有方的问题，对此他从未有过怀疑。人类的生活如何才能达到完全和谐，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人类的教化；他设想这个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